

以美立心 传承文脉

——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雕塑家吴为山



2024年5月29日,吴为山雕塑作品《问道》组雕永久立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市中心的巴特利公园。

新时代的中国美术扎根沃土、向阳生长,成为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力量,也在世界舞台上持续绽放光彩。深耕艺术领域数十载,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雕塑家吴为山既是中国美术蓬勃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潜心耕耘、锐意创新的推动者。日前,吴为山在接受采访时,聚焦中国美术的创作变迁、国际交流、价值传递、文化传承等话题,深入解读中国美术事业的鲜明特质与发展路径,阐释当代美术工作者扎根人民、守正创新、融通中外的使命担当,为新时代中国美术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访谈人:多年来,您亲身参与并见证着中国美术的发展。就您个人的体验和观察而言,新时代中国美术创作呈现出哪些变化?

吴为山:这些年来,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美术越来越贴近生活,也越来越走近人民。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时,我深刻体会到“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是创作的中心”。几十年来的创作实践,我真切地感到,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创作的根本出发点,并充分认识到,要把笔触投向平凡中的不平凡,去描写民众中那精神的光辉。

另外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我们对中华美的理解更深了。以前有些创作容易被形式带着走,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文化根脉和精神内核,特别是通过对“写意精神”的深刻研究与领悟,并在艺术创作中践行,努力创作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建立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文化自信的艺术理论。我自己在雕塑创作中,也一直在探索如何把中华传统美学精神转化成新时代的创造与创新资源,并化入艺术形式和语言,为人们所共情。

访谈人:中华文明向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注重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交流。近年来,中国美术在国际舞台上有哪些亮眼表现?在对外交流中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与趋势?

吴为山:通过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美术在国际交流方面迈上了新台阶,在“出海”中不断“出彩”。中国美术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独特的风貌,提升了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近年来,国内诸多美术机构通过策划一系列展览活动,将中国美术带进多个国家的国家级艺术殿堂,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对话;这些美术创作不仅是艺术品,更是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它们通过无声的艺术语言传播着中国精神,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国际认同感。

随着中国走上世界的中心,中国美术及美术家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我很荣幸的是,这些年我的不少雕塑作品被多个国家的重要博物馆和广场收藏与树立,我也在这些国家进行演讲,传播中国文化。如《孔子与苏格拉底对话》《天人合一——老子》等雕塑,他们在文明互鉴中找到了“共情点”。所以我提出了“一张脸、一颗心、中国魂”的理念——脸是文化身份,心是真挚情感,魂是世界和平。

可以说,新时代的中国美术,正在走一

条根植民族、面向世界、融通古今的路子。这条路不容易,但正因为它不容易,我们才更要更坚定地走下去。

访谈人:近年来,我国的美术创作无论在红色主题、现实题材,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转化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彰显了主流文化的生命力。您如何理解美术创作中的主流价值与主流文化?

吴为山:主流价值和主流文化是凝聚社会共识、塑造国家精神的重要力量。在我看来,主流价值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主流文化则是能够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形态。美术是传递主流价值的重要载体,因为艺术具有跨越语言和文化、触动人人们心灵的力量。美术作品通过形象传递思想,通过美感激发情感,在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这让我更为深刻地认识到,美术创作的核心是人民,艺术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教育人、感染人。美术作品不应是高高在上的展示,而是要走进人民的生活,以鲜活的内容、真挚的情感来感染和激励大众。因此,美术家应扎根生活、贴近人民,在真实的生命体验中、在时代创新力的驱动下,创作出具有温度的作品,使其所折射的主流价值为社会增添满满的正能量。

访谈人:我们看到,您的诸多雕塑作品承载主流价值、传递时代精神,可以说兼具力量与温度。可否结合您的创作实践,谈谈艺术家该如何以作品为媒,表达和引导社会的主流价值?

吴为山:主流价值和主流文化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美术事业作为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塑造中国精神的历史使命。在新时代,美术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创作中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在平凡的生活发现人性的光辉,感受时代精神对人的塑造,从而以创新的笔法描写刻在心灵深处的记忆与感动,让情感融入形式,让形式展现创新,让创新鼓舞与激励人们的斗志,形成美好的社会氛围,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理想化作美的追求、美的动力、美的行动。

在创作实践中,我始终致力于用雕塑的立体语言表达历史的中国、现实的中国、理想的中国,传递由远古走向现实、走向未来的中华民族精神。例如,在《长征组雕》中,通过生动的形象描绘长征精神,展现了红军将士的坚韧与信念;在《雷锋》雕塑中传播雷锋精神,让爱国主义教育更加直观、易于接受;而走向国际的一系列作品,则通过东西方文化代表人物的对话,向世界传递中华文化的哲学思想和人文关怀。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中国文化的深度,让世界从多个方面了解中华民族历史久弥新的风貌,也通过具体的人和事,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精神的

理解和认同。

雕塑的力量在于它是空间中的精神实体,它不仅能够塑造有形的形象,还能引领观众进入无形的精神世界。雕塑创作的过程,不仅是对艺术形态的探索,更是对民族文化和人类精神的追寻。我希望通过作品,让中华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涌动,让其不息的浪花滚滚向前,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

访谈人:传承文脉、创新表达、讲好中国故事,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立足当下,您认为艺术家、美术工作者该如何更好地肩负起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承担起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文化的责任?

吴为山: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艺术是其中极富生命力的感性表达,也是更直观、更能切入人人心灵的形式。艺术家是历史进程的同行者,也是美与信仰的守望者。我始终认为,艺术家首先应是极具家国情怀的文化工作者,其创作应根植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在延续中创新,于传承中拓展。中华美学精神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些年来,我在雕塑创作中不断提炼、体悟,从“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到“澄怀味象的生命体验”,从“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到“高明中和”的美学理想,无一不是对中国传统思想与艺术精神的再发现、再激活。

我所倡导的“写意雕塑”理论,是在世界建立当代中国雕塑艺术体系,从宏观上树立中国文化形象的价值标准。写意是中国艺术特有的气象。它不仅是一种技法形态,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世界观。在我看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研究这种文化的深层思维结构,让“象外之境”成为艺术创造的原点,让“以美通心”成为文化传播的路径。过往几年里,我曾策划“中国写意”系列展览走出国门,在法国、希腊、匈牙利引起良好反响。这也说明,只有扎根本土,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讲好中国故事,不是单纯讲述几个传奇人物或神话传说,而是要把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如对和谐的追求、对天地的敬畏、对人伦的重视等融入艺术语言中,使之可感、可亲、可信。中华文化所包含的中国智慧和道德价值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好中华文化,既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也是对世界的贡献。我在雕塑塑造中,希望以可视之“形”传达不可见之“魂”,让大写的中国人立于世界。如今,我的600余件雕像在世界30多个国家落成,成为中外文明对话的“目光相遇之点”,这也让我更加坚信:艺术的力量,是跨越国界的共鸣之力,是文化自信最真切的体现。我们要坚信,随着中国世界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文化、中国故事也将更加受到世界的关注与重视,并进一步对世界发挥“增值”作用。

访谈人:如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艺术创作的生态与方式,为美术创作带来新的课题和挑战。您如何看待技术革新与美术创作的关系?

吴为山:我始终认为,技术再先进也只是工具。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艺术家的思想深度和情感温度,是你能不能在作品里留下一个有温度、有力量的“人”的形象。今天,面对人工智能、数字媒介、全球交流快速发展的新局面,艺术家的创造更需要坚守文化主体性,提升思想深度与精神温度。当然,也要善于利用现代科技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更要发现由于生活方式和物质、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人的价值观及精神面貌的变化,并以艺术表现这种变化。在国际对话中,我们要善于立足文化根本,让新时代的中国艺术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奏响独特而铿锵的声音。

(访谈人:武文龙)

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大家谈

文物映中华

扇子,古来有之。古文献中的“箒”“翼”“便面”,皆为扇的早期形制或不同称谓。扇子功能不一,或为百姓消暑,或为君王仪仗,或为女子遮面,等等。扇子种类繁多,按形制分,有团扇、折扇等;按材质分,有竹扇、羽扇、丝绸扇、象牙扇、纸扇、蒲扇等;按制作方式分,有编织、刻画、上漆等;按地区分,有川扇、杭扇等。

扇子最早为引风遮日、消暑纳凉的器具,相传尧时“曾做物,吊于室中,动摇生风”。《淮南子》中载有周武王利用扇子招风纳凉的故事,“武王荫囑人于榭下,左拥而右扇之,而天下怀其德”。战国“楚襄王时始用羽做扇”,又称“翟扇”。四川百花潭出土的战国嵌错宴乐攻战纹铜壶,描绘了贵族日常生活场景,其中第二层有手持长柄大扇的侍者,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与扇子相关的实物资料。

团扇和折扇是最常见的扇子。其中,团扇的产生远早于折扇,其形状团圆如月,暗合传统文化中的合欢吉祥之意,也被称为“合欢扇”,其材质多为丝绸,故又常被称为“纨扇”或“罗扇”。杜牧在《秋夕》中以“轻罗小扇扑流萤”,写出了少女手持团扇的灵动;苏轼在《贺新郎·夏景》中写“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以团扇衬托美人之姿;李商隐的《代董秀才却扇》中的“莫将画扇出帷来”,描绘了“却扇礼”的场景——古代婚俗中有新娘用团扇遮面、礼成后撤扇的仪式,彰显了中式婚姻的含蓄美。

折扇在北宋时期由日本僧人传入我国,因其使用方式为撒开和聚拢,文献中多称为“撒扇”或“聚头扇”,初期多由“仆隶”使用,直到明代开始盛行,清代广泛使用。明代永乐皇帝曾在扇面题词后分赠臣属,促进了折扇的流行。文人雅士开始盛行手执折扇,并在扇面上进行书画创作,产生了众多题材丰富的艺术作品,或书法、或山水、或花鸟、或人物,在扇文化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就结构而言,扇子主要由扇骨与扇面组成。扇骨中两侧宽大的叫大骨,中间的扇骨叫小骨,扇骨以扇钉固定,扇骨尾端为扇头。扇头形式多样,最普通的圆形扇头也被称为“和尚头”,还有挑方头、燕尾头、鱼尾头、直式头等。

文人用扇,往往还为扇子配备精美的饰件,即扇坠。扇坠多由翡翠、玉石、琥珀、象牙、珊瑚等材料雕刻,配以精巧的丝绦,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折扇平时收纳在扇囊内,扇囊是保护折扇的重要配件,兼具装饰功能,也叫扇袋或扇套。扇囊一般为丝绸制成,造型上宽下窄,饰有精美的刺绣纹样,多为寓意吉祥的花鸟、诗词、博古、山水、人物等题材。如果有多把折扇,往往会收纳保存于一个专门的箱子内,即扇箱。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有扇子及相关文物1200余件,包括成扇、扇面以及扇子的部件和其他有关器物,如扇骨、扇坠、扇袋、扇箱等。这些文物中包含大量名家作品,如清代张问渠的花卉团扇,其扇柄雕镂,扇面一面为张问渠的兰花图,另一面为杜成章、李杜合写的行书;又如清代包世臣、李育的书画合璧折扇,明代文徵明的行书扇面,明代沈硕的山水扇面,清代八大山人的芙蓉图扇面等。此外还有明代唐寅仿韩熙载夜宴图,在第一



清代包世臣行书折扇扇面



清代李育花鸟折扇扇面

怀袖盈凉揽清风

漫说扇文化

史春月



清代张问渠花卉团扇扇面

清代杜成章、李杜行书团扇扇面



明代文徵明行书扇面

幅场景“禀报”中,韩熙载坐在椅子上轻摇团扇,旁边的蓝衣仕女手执红色大扇,生动展现了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贵族的日常生活。还有一件东汉时期的红陶持便面女俑,一手执便面,一手执囊,直观反映出便面的使用方式,而这也应是当时女子出行的标准装束。

值得一提的是,扇子对生活 in 炎热气候中的重庆人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生活物品。当地知名的扇子如荣昌折扇、临江油纸扇、铜梁棕扇等,都属于川扇的花萼。川扇又称“蜀扇”,蜀地盛产竹子,明代以来就是重要的折扇产地。

(图片均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品,由作者提供)

《赶牲灵》:赶脚路上的深情

史小溪

陕北民歌是陕北地区的音乐史诗,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其关于人性、人情的自由表达,带来充满生命力的审美体验。同时,从陕北民歌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世界青年联欢节、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新春音乐会、波兰华沙国家剧院、德国柏林UDK音乐厅等国际舞台唱响,到陕北各地方艺术团出访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带去演唱,陕北民歌跨越地域阻隔,穿越漫长时光,成为中国民间音乐的突出代表和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三盏盏的那个灯,戴上了那个铃子哇哇的那个声……你若是我的妹妹哟,招一招你的那个手,你不是我的妹妹哟,走你的那个路……”这是陕北民歌中广为流传的代表性曲目《赶牲灵》。其曲调节奏缓慢、深情悠扬,唱腔雄厚朴实、高亢动听,给人一种幽远、深邃的感觉,反映了陕北赶牲灵人的真实生活。

赶牲灵人,也叫脚夫。旧时指赶着骡、驴、马等牲口运送货物的人,或被人雇佣以赶牲口为生的人。牲灵,是陕北人口语中对牲口亲切的叫法,陕北过去山大沟深、道路崎岖,春耕秋收、行旅运送等诸多事宜,几乎都离不开马、牛、驴、骡这些大牲畜,所以对其爱护备至,充满感情,称其“牲灵”,仿佛它们都有灵性一般。

所谓灯和铃子,是指脚夫给牲口的装饰,特别是远行上路,领头的牲口头上总束绑红缨子,装饰三面反光的小铜镜子,戴一串“叮铃叮铃”响的铜铃,牲灵队列走起来格外精神。另外,铃声响动也有利于在路径窄狭处或夜深云黑时,警示迎面过

来的人或牲口队伍相互避让。

此曲共三节,男女皆可作为主唱,只要把歌词中的“妹妹”改为“哥哥”或“哥哥”改为“妹妹”即可,也可男女同声合唱。歌子或许是一位赶牲灵的人唱给他路上某歇脚处交好的女子的,或许是路上某位开店女子唱给她交好的赶牲灵哥哥的,无论如何,歌声中都体现了一种渴望的心情——他们在期待着心上人的到来,焦急而欣慰地张望着。

赶牲灵题材的民歌自古流传,早期叫“脚夫调”,比如“你吆上骡子我开店,来来往往咱们常见面”“骑骡子骑在马上身,想妹妹想得我把病得上”等。今天的听众在听这些曲调时,或许会对赶脚人的浪漫和自由充满向往,殊不知,那脚夫营生有多少苦累辛劳。漫长的赶牲灵路上,除了烈日、狂风、暴雨的侵袭,土匪抢劫的危险,还有令人绝望的寂寥困顿,所以那些歌曲中,总带着一种古朴苍凉的味道。

这首《赶牲灵》的作者是吴堡县张家堰的张天恩,他出生于1911年,家中贫穷,目不识丁,但自幼随父赶牲灵谋生,常往来于陕西、山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见多识广。张天恩极富艺术才气,能歌善舞,又有一副高亢悠扬的好嗓子,艰辛的赶脚生活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青少年时就编创出许多民歌。1940年起,他不断编写赶脚题材的民歌,雕磨修润歌词,最后完成了这首民歌。1945年正月乡间“闹红火”,此歌经他首唱,很快传遍黄河两岸,走红塞北江南。张天恩一生编创了近百首陕北民歌,被我国著名作曲家吕骥称为“民歌大师”。

都火

中国彝族舞蹈。

流传于云南、四川的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是彝族火把节期间的女子集体歌舞。彝语“都”即火,“火”为唱,“都火”即唱火把节。不同地区也有都格、着火等不同名称。节日从农历六月二十四起,为期3天。第1天打牛打羊,准备食物,晚上打着火把游历山野田间。第2天是节日高潮,要斗牛、斗羊、赛马、摔跤,妇女们要跳都火,持续到晚上,围着篝火起舞。第3天活动进入尾声。都火舞者要一手持伞,一手前后互牵方巾或拉前人的荷包带,连成圆圈。围圈而舞时以逆时针方向为主,但也有顺时针、逆时针方向的交替而舞。舞蹈无伴奏乐器,一人领唱众人应和。歌曲一般是山地民歌,可无限反复,表演者可即兴编词。舞蹈的步伐古朴简单,多为平步、八字步、交叉步等,上身微微俯仰,整体微转,姿态端庄。

(作者:闫晶)

条目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

文化百科

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